

斜晖脉脉水悠悠中，黄山白岳、寒烟衰草，  
流水中莫名的感动，都由这信手拈来的书  
名中一一凸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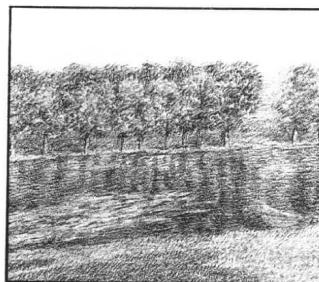
# 斜晖脉脉水悠悠

王振忠著



# 斜晖脉脉水悠悠

王振忠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斜晖脉脉水悠悠 / 王振忠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8

(书趣文丛；第四辑)

ISBN 7-5382-4546-4

[I. 斜… II. 王… III. 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 随  
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2840 号

## 斜晖脉脉水悠悠

王振忠 著

---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字数：142,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 3/4 插页：2

印数：10,001—16,000

---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

责任编辑：王越男

技术编辑：华德

装帧设计：张宏

美术编辑：宋丹心

特约校对：洪光仪

责任校对：王玲

---

ISBN 7-5382-4546-4/C·172

---

定 价：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 书趣文丛第四辑

- ① 独语      ② 斜阳系缆  
③ 放虎归山      ④ 不肯进取  
⑤ 考槃在涧

赵园著  
吴方著  
李零著  
黄梅著  
葛兆光著

- ⑥ 寻找手稿      ⑦ 阅读日本  
⑧ 浮世绘      ⑨ 旧影与新知  
⑩ 斜晖脉脉水悠悠

李庆西著  
陈平原著  
刘东著  
汪晖著  
王振忠著

2AC43/21

第四辑

小引

八十年代有“文化热”，九十年代据说又有新的“文化热”。两大热潮，聚讼纷纭，众说杂陈。爱之者说这一次是引进之先声，开放的前提，或者是说彼一次是几千年优秀传统之传承，几十年前赴后继的小结；攻之者则责此为“全盘西化”，或怨彼为“义和团病”之再现。不论如何，中国思想文化界由此可以有“众说”和“聚讼”之可能，实在是大好事一椿。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不仅觉得煞是好看，而且深为庆幸：中国究竟是越来越进步了！

两次发热，佳作如潮，现在或将来想必均有我们同行中的才俊之士，辑之成书，销以行市。现在我们只做一件小事：取其将来的巨编的可能的子遗，编入《书趣文丛》，作为这一丛书的第四辑。未见皇皇巨编，先辑零星“子遗”，于理不合，于礼不周，但世上某些事也许非要如此“非理性”方可。

古往今来，凡是文人学士所熟悉的事，必然同“读书”一事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因为文人之为文人、学士之为学士，说到底，究竟大多是“从图书馆里来又回到图书馆里去的”。他们有时也要受命去杀猪，去种田，去放牛，也会去做官，去经商，但是，一为文人学士之本来面目，就离不开书。有这一点，我辈附丽于文人学士的所谓“文化服务工作者”才有些小事可做，讨得些许生活之资。这一辑所欲呈现者，是近年热潮中涌现的中青年学人的读书心得之若干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学人中以近年比较活跃的为主，而且限于交往，大多是在本职工作中经常请益、讨教的一些位熟人。就中，吴方先生英年早逝，最为可惜。其他各位则在学界文坛驰骋正勇，学术生命如日方升，相信今后当有更成熟的作品出现。但即此一部分小小的学术小品，亦可看出，江山代有才人出，今人是不让前贤的。我辈生逢其时，可以为八九十年代优秀学人编书效力，为中国文化界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成就的一个小小的侧面，深有幸焉！

### 脉 望

一九九六年三月



◎斜阳残照徽州梦／1

◎银桂树下的断想／15

◎老房子／26

◎纤绳荡悠悠／41

◎未曾散尽的幽冥／51

◎学究慨世／60

◎西洋镜中的文化变迁／70

◎咖啡还是茶？／83

◎糠摆渡／90

◎祁太溜子，蒲州梆子／98

◎一张苦嘴，一把笔刀／117

◎作幕吃儿孙饭／129

◎说凤阳，道凤阳／138

◎得饶人处且饶人／151

◎旗下街／161

◎波渺渺，水悠悠／170

## 斜阳残照徽州梦

深秋时节，汽车颠簸在皖南的低山丘陵间。窗外，清晨的雾色恍若淡薄的轻纱，透着寂静的朦胧……

这是通往黟县西递村的道路，山间小道蜿蜒曲折、坎坷不平。真的难以想象，在交通条件不便的古代，徽州人外出究竟曾经历了怎么样的艰难！

徽州，亦称新安，地处万山之间。在古代，徽州人外出，通常只能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动辄走上十几里、几十里路。故而，走惯了山间鸟道的徽州人，在平地上也往往安步当车。清儒顾炎武在《肇域志》中曾谈到，一些徽州人“短褐至骭，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徒步跋涉数千里晋京赶考，“而吝舆马之费”，旁人一打听，原来家中都是拥赀千万的巨富。这在其他地区的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对徽州人而言，却实在是一种习惯成自然。

同车的一位黟县农妇告诉我，她家每人仅有六分五地，而怀中的那位三岁男童则因“生也晚”而已无地可分。在历史上，徽州“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说法。由于地狭人

稠，本地每年生产出来的粮食仅能维持三个月左右的口粮。因此，徽州人颇像希罗多德笔下的希腊民族，“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为了弥补生存条件的缺陷，他们不得不向外拓展，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就这样，大批的徽州人怀揣几两碎银，挟着《士商要览》、《天下路程图引》，呼朋引类地外出经商，以至于“无徽不成镇”的俗谚在长江沿线尽人皆知。

在生意场上，徽州人生性俭朴，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所以“徽州算盘”的名气蜚声远近。各地的盐业、典当、木材、粮食、茶叶和海外贸易等许多行业，都被徽州人所垄断。其中，盐、当、木商人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获利最巨。

由于无远弗届，见多识广，徽州人的性格特征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徽俗多行贾，矜富壮，子弟裘马庐食，辐辏四方之美好以为奇快”。（汤宾尹：《睡庵集》卷二三）富裕的徽商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将当时全国各地最为精致东西都带回到了徽州本土。反映在皖南的传统村落中，就表现为无论是整体环境还是单体民居，在质量和艺术水准上均属上乘。

记得从前在旧书摊上曾看过一本书，书名一时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是乾隆刚刚龙驭宾天，才亲政的嘉庆皇帝就查抄了权臣和珅的家产。在抄家清单上，赫然列有“徽式新屋一所七进，共六百二十间”。当时并不清楚“徽式新屋”究竟指的是什么，只知道那该是一种相当时髦的居住形式。后来见到清人钱泳的一个说法：

造屋之工，当以扬州为第一，如作文之有变换，无雷同，虽数间小筑，必使门窗轩豁，曲折得宜，此苏、杭之工匠断不能也。（《履园丛话》卷十二）

在清代，扬州是大批徽州盐商麇居之地，民居建筑“结构曲如才子笔”，主要就反映了徽派的风格。这种风格不仅在总体创意上，而且在建筑的细部处理中均颇具特色。以后者言之，最为突出的就表现为徽派建筑中的精雕细刻。钱泳曾指出：“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最盛，亦最巧。”在“刀头具眼，指节灵通”的徽州匠师手下，不论是清新淡雅的砖雕，华美姿丰的木雕，还是浑厚潇洒的石雕，无不巧夺天工。从这些著名的“徽州三雕”中，人们不难看出“徽派版画”和“新安画派”的艺术根基，更不难想象徽商是如何凭藉着巨大的财力，用最为精美的方式向世人展示徽州文化独特的内涵。

在明清徽州的一府六县中，黟县是个山陬水滨的荒僻小县，经商风气迟至清初方才蔚然成风，但却出过江南六大豪富之一的胡贯三。据说，胡贯三是西递胡氏二十世祖，他曾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各大商埠中经营着几十家的典当铺和钱庄，资产折合白银数百万两，聚族而居的西递村正是因为胡贯三的原因而臻于极盛。西递的宅院最多时曾达六百幢，有两条大街，九十九条小巷，烟火人丁相当繁盛。迄至今日，虽然历经了一百余年的世事沧桑，仍然保留有明清民居三百余幢，其中，保存完好的多达一百二十四幢。洁白的粉墙，黝黑的屋瓦，飞挑的檐角，鳞次栉比的兽脊斗拱，以及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绵亘着一幅宗族生息繁衍的历史长卷。穿行其间，思绪随着青石板巷步移景异，身心徜徉于时光倒流的幻象中，遥远的历史记忆渐渐复苏……

在西递村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种独特的边门，沿着门框雕刻着“商”字形图案，任何一个穿堂入室的人，都要从“商”之下走过。在徽州人看来，“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许承尧：《歙事闲谭》）“商”字形图案或许正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具象。这让我想起了此前看过的一部徽商家谱。在那部家谱所附的墓图上

方，写着好几个“×××朝奉”的字样，令人相当吃惊。因为小时看“三言二拍”，“徽州朝奉脸”和“徽州朝奉口气”，总是明清小说中塑造反面人物性格的典型形象。绍兴师爷范寅在所著《越谚》中，也将“朝奉”二字列为浙东一带的“贱称”。其实，在徽州，就像高悬于芸芸众生头顶之上的这个“商”字形图案一样，“朝奉”却是一种受人敬重的尊称。徽州人口中的“朝奉”和“孺人”，相当于时下惯用的“先生”和“太太”。至于“朝奉”的由来，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清代前期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曾记载说，明太祖初定徽州，徽民夹道相迎，朱元璋垂询他们的身份，徽民皆自称“朝奉”。于是，洪武帝就顺水推舟道：“多劳汝朝奉的！”金口玉言，徽人便认为得了皇帝的集体加封。出身于黟县的清代考据学家俞正燮，查证出“朝奉”和“员外”是相同的涵义。因此，“朝奉”这个称呼在徽州的普及，就和“员外”在其他地区的普及是同样的。宋代称富人为“员外”，因为富人能够得到赐爵，但是在正员之外，而“朝奉”也正是与员外相似的“赐爵阶也”。（《癸巳存稿》卷四）稍后于俞正燮的著名学者梁章矩在所著《称谓录》中也有“朝奉”一条，他先是引用翟灏《通俗篇》中的考证说，秦始皇曾许乌氏倮为“朝请”，而徽州人中十之六、七是商人，所以自称“朝奉”，以表达对乌氏倮这位商界前辈的追慕。梁氏还指出，“朝奉”一词渊源有自，除了秦代有“朝请”外，汉代还有“奉朝请”，意思是“逢朝会请”，即每逢上朝便应召议事，并不实指某个官位。当时的三公外戚、皇室诸侯，多为“奉朝请”。到了宋代，才有了明确规定，“朝奉大夫”是从六品的官员，而“朝奉郎”则系正七品。梁氏最后总结说——朝奉，“在宋为官，今为掌质库之称”。梁章矩所说的“掌质库”，也就是指从事典当业的商人。这是因为：自明代中叶以来，由于白银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日益普遍，城乡居民对货币的依赖逐渐加深，各地都出现了常设的当铺，而经营当铺的主人几乎都是徽州人，因此，原先在徽俗中用

以称呼富翁的“朝奉”二字，后来竟成了典当业主的代名词。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在鸳鸯蝴蝶派笔下“益大当”的马老先生，仍然是位循资累进的“头柜朝奉”。（赵苕狂：《典当》）

在明清时期，“徽州朝奉锡夜壶”一说，曾在江浙一带广为流传，徽商的形象是相当不佳的。《云间杂识》曾记载了这样一桩趣事：

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宦骇问故，对曰：“松（江）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宦惭不能答。

在传统社会，“富人总是为穷人所怨恨，（而）外来的富人则更是遭到加倍的怨恨”。（查姆·伯曼特：《犹太人》）无论是在西方的犹太人，还是中国的徽州贾客，他们的境遇都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徽州人或许并不比历史上出现过的商人更加刻薄或吝啬。从总体上看，他们“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文集》卷十二）是一个素质较高的地缘性商人群体。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当时，儒家的道德规范已深深地影响着徽商的实际行动——文化水准较高的徽商直接从宋明理学中汲取道德的启示，而一般粗通文墨的商人则依赖通俗化的儒家伦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版）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童叟无欺是“天理”，短斤缺两是“人欲”，因此“存天理，灭人欲”——买卖上的绝对公平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能做到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亦即所谓的“良贾”，也就称得上是“服贾而仁义存焉”，更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出“良贾何负于闳儒”的呐喊。这恰好印证了王阳明所孜孜提倡的“四民异业而同道”、“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的主张。这样，在

“道”的面前，士农工商也就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并没有高下之分——不知这是否就是“商”字形图案所折射出的文化底蕴？

与这种图案相映成趣的，则是一幅相当惹人注目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很让人联想起《儒林外史》中的一段描述。《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讲两个徽州文人牛玉圃和牛浦到扬州河下（徽商聚居区）盐商万雪斋家中：

当下走进一个虎座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鹅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走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着斑竹帘。……揭开帘子让了进去，举目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

《儒林外史》中这家徽商的室内布局，令人顿生似曾相识之感。而西递的这幅对联，则更为直观地揭示出徽州独特的乡土习俗。明代著名学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

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太函集》卷五二）

做生意是为了牟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

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赚得一笔钱后，为了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儒、贾之间的良性循环。这里的“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可能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涵义，那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几位兄弟都从事举业，那大家只好喝西北风，所以还必须有所分工。这种家庭成员的分工，在徽州地区可能相当普遍。对此，何炳棣先生通过研究，将之归纳为“the policy of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卷十七，一九五四年）而西递的“桃李园”就是这种分工的一种体现。桃李园建于清咸丰年间，宅院由一贾一儒两兄弟构思、营造而成，分为前、中、后三进，背向序列三间，前进是两兄弟共用的空间，二进为做生意的住居，三进则系儒者所居。跨进居室，那屋梁上的斗棋、雀替、驼峰，楼层的栏板、柱琪、莲花门，天井四周上方的檐条，石墙旁的屏门隔扇，以及窗扇下方的花台、栏杆等处，目之所见，处处都是雕镂精细的木、砖、石三雕。二厢房用屏门组成，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漏窗上的图案，称为“冰梅图”——相当多的半爿梅花落在一方方冰裂纹上，除了令人叹为观止外，它还寓意着“梅花香自苦寒来”，严冬将尽，读书人“十年寒窗”，终于金榜题名，一鸣惊人。这种“冰梅图”，在徽商住宅中所见极多，处处烘托出“贾而好儒”的气氛。

在徽州，“十户之村，无废诵读”，是个一点也不夸张的说法。在明清两代，徽州人在科举上的建树令世人刮目相看。据不完全统计，从一六四七年到一八二六年，徽州府产生了五百一十九名进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乡及第的），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至六名。在此同时的一百八十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九十四名，其中有十四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五十九名，有五名是徽州人。（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六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在徽州当地，“连科三殿

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的科举故事，多得不胜枚举。在现存的明清民居中，有不少就是科第阁阙的旧家宅院。

“大夫第”是清初的官宦故居。在临村街墙上，悬空挑出一座小巧玲珑的亭阁式建筑。这座悬阁危楼，上书“山市”楼额，原本是供主人怡情养性、凭栏观景用的。据当地村民告知，每当春天，遍野的映山红煞是好看，于此远眺，真有“山花若市”之感。可惜的是，就在数月前，不知是谁心血来潮，将之改建成“抛彩球，选佳婿”的“古绣楼”——春情荡漾的古装少女娇滴滴地倚栏媚笑，而自以为领略了“民俗风情”的众多游人则攒集楼下，在鸳鸯彩球的争夺中，回归于抛彩选婿的“古代”。……据说，这是为了开展“民俗旅游”。古为今用，原本亦无可厚非，只是先前古朴典雅的亭阁，竟被髹漆成腥红色，在粉墙黛瓦的西递古巷道间，多少显得有点不协调，仿佛小镇美人的招摇，颇令人联想起方鸿渐所痛恨的那种“落伍的时髦”。

在历史上，徽州各地有的是望夫楼，有的是女祠，但却绝不会有临街的绣楼。在明清时期，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根据徽州俗例，男子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年满十二三岁就得完婚，然后外出经商。从此，萍飘蓬转，有时，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绩溪人胡适先生曾回忆说，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俗谚，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据说，曾经有一对夫妇结婚才三个月，丈夫就出远门做生意，妇人以刺绣为生，每岁积羨余易一珠以记岁月，称为“记岁珠”。后来丈夫还乡，妇人已经死了三年。启视其箧，积珠已二十余颗。(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年届青春的少妇，丈夫长年外出，“茫茫长夜何由彻？”寂寞的徽州妇女，每当夜幕降临，面对着空荡荡的深宅大院，有的将一把铜钱抛在地上，然后再一个个捡起来；再把它们撒开，再一个个拾起。如此往复，直到累得精疲力竭，直

到东方泛出鱼肚白，直到青春少妇熬白了乌黑的秀发。……迄至今日，在昔称“程朱阙里”的徽州大地上，依然矗立着许多错落有致的大小贞节牌坊，历经数百年的凄风苦雨，似乎仍在无声地诉说着很久以前思妇的寂寞与辛酸。其实，徽州的妇女何尝都是用牺牲热情眷恋名教，以贞节来装饰男人的体面！？钱钟书先生曾引用清人施闰章《愚山诗集》卷二《枣枣曲》自序，“谓海阳有‘香枣’，盖取二枣剥剥叠成，中屑茴香，以蜜渍之，询其始，则商人妇所为寄其夫者，‘义取早早回乡’云。……海阳妇以枣与茴香谐音，望夫早归。”（《管锥编》第五册，页15）“海阳”也就是现在的安徽休宁。“留守女士”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寄托着绵绵的情意和不尽的相思。

数年前的一个清明时分，我曾奔波在由歙县县城到深渡的公路上——这条道路在历史上曾是徽州人外出经商的一条主要通道，在《天下路程图引》中被列为“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当年，不知有多少“芒鞋跣足”的徽州人从这里走向前途莫测的商场。数百年后的我，虽然已无从体验他们彼时的心境，但在那个落雨纷纷的季节里，眼见着低山丘陵间参差隆起的坟冢，看着公路两旁小树上五颜六色的“挂钱”（徽州扫墓时的一种习俗），以及偶尔掠过窗外的一、二只乌鸦，我也分明体味到作为异乡人的那份落寞和孤单！据说，徽州人所做的买卖相当之多（当时有“无徽不商”的说法），但有两样东西是最为忌讳的——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因为“茴香”的谐音是“回乡”，“萝卜”则意味着“落泊”。所以直到今天，徽州地区仍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徽州商人心里慌，怕卖茴香萝卜干”。当然，或许是有太多太多的新安商贾在异乡卖起了萝卜干，所以除了牌坊外，徽州人还设计出独特的女祠，将守节的妇女牌位供奉其中。也就在那个清明时分，我曾到过歙县棠樾的清懿堂（亦即女祠）。当时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整修，但见三进五开间的女祠坐南朝北，硬山式的外观裸露着

一整面灰白色的山墙，在阴郁的天空下，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严严实实，见不到一扇小窗。走进祠堂，迎面扑来的是丝丝缕缕的蜘蛛网。祠堂虽然空旷而残破，但内心的震撼却异常强烈——在对女人贞节的表彰中，我读到了男人的一种恐惧！时至今日，或许是为了招徕旅游者，不少人都忙着修复维纳斯的断臂，甚者为之披上现代派的广告衫。于是乎，原本很有沧桑感的历史建筑上，却嵌入了几根崭新的木料，添置了不相干的诸多摆设。说真的，故地重游，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因为那毕竟总让人联想起并不高明的古董赝品。

说到古董赝品，在西递的巷陌民居门前，处处是古董摊子。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些徽州的契约、文书。五、六十年代，在皖南山区发现了大批的契约、文书，其数量空前。现存于国内各研究机构的十多万件(册)徽州文书，成了研究宋至民国(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珍贵历史文物。特别是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对徽州文化的研究，迅速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徽州学”(或称“徽学”)可望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契约文书更是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国外有的汉学研究者甚至断言，这些徽州原始资料，是“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和经济的关键”。故此，原本一钱不值的契约、文书洛阳纸贵，行情看涨。与此同时，随着东南沿海城市居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古董鉴赏之风悄然蔓延，精明的古董商人也就无孔不入，即便是西递这样的僻野乡村，也不止一次地被他们光顾过。于是乎，粉墙黛瓦下站立的古董摊主(西递村民)，在他们纯朴的眼神底色上，分明增添了一丝精明和狡黠。粗略一翻，摊上的契约、文书数量着实不少。最早的似乎是道光年间，最晚的则到民国。通常是将一张标着道光年号的租佃文书与民国年间铅印的契约粘在一起，中间加盖一枚看上去不算太旧的大印。其真赝也只有天知道了！

或许是历史的一种循环吧，数百年前，当徽州人因经商而囊